

##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六德》的先秦德育思想探析

蔡利红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娄底 417000)

**[摘要]**《性自命出》和《六德》是郭店楚简中有代表性且性质相同的两篇简文,其在德育内容方面的阐述分别以“性情说”和“血亲伦理”为核心。这两篇简文在德育方法方面,分别突出“礼乐教化”和“伦理教化”的作用;在德育目标方面,分别以“生德于中”“德行匹配”为主要内容。研究两篇简文,并进一步考察先秦德育思想在推进传统德育思想研究的进展及促进当代社会德育实践的发展方面所蕴含的价值。

**[关键词]**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六德;先秦德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9)02-034-12

王国维先生曾云:“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sup>[1]</sup>,诚哉斯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地下简帛古书重见天日,不仅让我们有机会一睹先秦古书的原貌,更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展。其影响之大,甚至有学者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的主张<sup>[2]</sup>。在德育思想教育研究方面,现有的简帛古书能在多大程度上丰富我们对先秦德育思想的认识,又对我们现在的德育思想研究有什么促进作用?为此笔者选取了出土文献中较有代表性的两篇简文——《性自命出》和《六德》,试图以此一窥先秦德育思想的某些特质。

### 一、郭店楚简相关文献概述

本文选取郭店楚简中《性自命出》和《六德》两篇简文作为研究对象,两篇简文在形制和性质上存在着许多共同特征,是我们相关研究的绝佳样本。

#### (一)竹筒形制

在郭店墓地发现的这一批竹简共804枚,竹筒的形制和内容不尽相同。李零先生在整理这批竹简时依照“形制、字体的分类是第一步,内容分类是第二步”的方法将这些竹简大致划分为五个类别<sup>[3]</sup><sup>6</sup>。本文研究的两篇简文,据竹筒形制和其内容判断其属于同一组文献,与其属于同一组文献的还有《成之闻之》和《尊德义》两篇。从本文主要探讨个人修身的道德层面出发,笔者选取了与之关联更为紧密的《性自命出》与《六德》两篇简文作为研究对象展开讨论,属于同一组材料、主要阐述为君之道的《成之闻之》与《尊德义》两篇则不是本文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从简形来看,《性自命出》与《六德》的简端都为梯形;从简长来看,本文所要探讨的两篇简文的竹

[收稿日期]2019-09-13

[作者简介]蔡利红(1997—),女,湖南娄底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2015级本科生

[指导老师]谢科峰

简长度都为 32.5 厘米,均为最长简;从编联来看,连篇简文竹简的编联方式皆为两道编绳,都将简分成上、中、下三段,且编距皆为 17.5 厘米,是这一批郭店竹简中编距最大的<sup>[4]</sup>。因此,从竹简形制上将两者归为一个类别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意见。

## (二) 竹简性质

从内容上看,这一批郭店楚简主要涉及的是儒、道两家的学说,而本文所要研究的两篇简文被许多学者们定性为儒家文献。如李零先生就在其著作中《性自命出》和《六德》归为儒家文献<sup>[3]6</sup>;李学勤先生<sup>[5]</sup>和彭华先生<sup>[6]</sup>也认为其属于儒家著作。

李学勤先生曾谈到“我国历史上有不少以书籍随葬的记载,在古墓里发现书籍实物的事例,史不绝书。书籍用来殉葬必然是死者生前读用或爱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死者身份和思想倾向的反映”<sup>[7]44</sup>。关于郭店楚简,他指出郭店一号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中包含有多篇古籍,而内容主要涉及到、儒两家学说,因而判断墓主生前可能是一位“兼习道、儒的博通学者”<sup>[8]79</sup>。墓主人的身份对我们研究简文的性质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郭店墓中出土的器物有助于我们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进而有助于我们了解本文将要研究的两篇简文的性质。在该墓中,能用来判断墓主人身份的物件有出土的上面刻有“东宫之杯(师)”的漆耳杯、鸠杖以及铜剑、铜戈,等等。

李学勤先生认为,被整理者是为“东宫之杯”的漆耳杯应该释为“东宫之师”,即“太子的老师”之意,而其墓葬中《老子》《子思子》等抄本,或即用为太子通读的教材<sup>[8]79</sup>。在其墓葬中还发现了两根鸠杖,所以可判断其为一名年事已高的男子<sup>[9]391</sup>。在此基础之上,一些学者更进一步,把墓主人的身份做了进一步具体化的尝试。廖明春先生推断其可能是孔子七十子之后学,尤其是子思之徒的可能性最大<sup>[10]</sup>;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楚顷王之师<sup>[9]390-395</sup>、陈良<sup>[11]</sup>、环渊<sup>[12]</sup>、慎到<sup>[13]</sup>;更有学者认为其是屈原<sup>[14]</sup>。

除却上述观点外,还有部分学者同意“东宫之师”铭文的释读,但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如裘锡圭先生把“师”释为“工师”,认为“这字样也许只是制作杯子的工匠所为,说明这杯子是某人所作的”<sup>[15]</sup>。还有的学者认同发掘者的观点,即认为漆耳杯上的文字是“东宫之杯”。李零先生就持这种说法<sup>[16]</sup>。认为漆耳杯与墓主人身份无关的还有德国的瓦格纳先生和法国的马克先生,他们认为“这个杯子并不能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因为它很可能只是一件礼品——譬如朋友的赠送品”<sup>[15]</sup>;彭浩先生也认为刻有“东宫之师(师)”的漆耳杯并墓主所有,而是他人赠送给墓主或墓主生前所得<sup>[17]</sup>。目前,学术界关于墓主人的身份以及漆耳杯上的字都还没有定论。不过在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之上,笔者认为,关于墓主人是一位兼习儒、道的年长的男性学者这一判断还是成立的。至于其身份,从其墓葬形制和漆耳杯上尚不能确定的字来看,不能肯定其为太子的老师,不过不论漆耳杯上的字是“东宫之师”还是“东宫之杯”,是墓主所有还是别人赠送,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杯子与东宫还是存在一定关系的,而且最终这个漆耳杯还是归墓主所有。

据发掘者的观点,该墓位于纪山楚墓群中,且从墓葬形制与同墓所出的器物分析,该墓具有十分明显的战国时期楚文化的特点,该墓葬所处的年代应该是战国中期偏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墓主是战国中期偏晚的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之语。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先秦时期的楚国,有一批专门著书教育贵族的知识分子的存在。

从这些认识出发，笔者认为，虽然我们难以确定墓主人的确切身份，但墓主人应该和为东宫太子提供教育的士大夫们有着密切的关联，至于其身份，则不需要很显赫，这也就解释了墓主拥有刻有“东宫之杯”的漆耳杯而墓葬形制显示其身份较低的原因。

由此，墓中出土的郭店楚简作为墓主“生前读用或爱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死者身份和思想倾向的反映”<sup>[7]44</sup>，我们可以推测其为教育东宫太子而挑选编撰的书籍，撰述的时间以墓葬下葬年代为下限，即战国中期偏晚。

## 二、郭店楚简相关文献德育思想探析

### （一）德育内容

根据张耀灿先生的观点，德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向教育对象实施教育的具体要素<sup>[18]</sup>。在先秦时期，统治者为了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也会对民众进行思想上的道德教化，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六德》中所蕴含的德育内容。

#### 1. 《性自命出》之性情说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主要论述性情思想，李零先生据内容将此篇简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从论述性情的生发出来谈教习与心性的关系，以及礼乐的教化内容；下篇主要讲“心术”，即上位者在进行礼乐教化之时应该掌握的心理技巧<sup>[3]133-156</sup>。

本篇简文从一开始就道出了“天、命、性、情、道”之间的关系，即“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因而可知这里的生成机制是由“天”及“命”及“性”及“情”及“道”的。其中“性”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它是连接“天”“命”与“情”“道”的桥梁。那么，这里的“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呢？简文有“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之语。这句话诠释了“性”的内涵即喜怒哀悲等发自本心的自然之气，而这种发自人内心最真挚的性又出自从天而降的命，人之承受于天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赋本质与本源，所以它本身是无法做到“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的，故而简文有“凡心有志也，无与不□□□□独行，犹口之不可独言也”之说，认为只有通过“心”才能做到。<sup>[19]73-77</sup>郭沂先生认为简文作者将心志分成了“作”“行”“定”三个阶段，而它们又分别是由“物”“悦”“习”引起的。正是在“心”的基础上，才有简文的“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内入之”之语<sup>[20]</sup>。这反映了心与性的相互关系。

《性自命出》主张情出于性。简文有云：“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也就是说“情”是“性”的表现形式，“性”是“情”的来源，“情”与“性”是相互验证的。在简文中又提到情是“信之方也”，即信是真情的标志，简文又云：“凡忧思而后悲，凡乐思而后忻。凡思之用心为甚。难，思之方也，其声𠂔，则[□□]，其心𠂔则其声亦然。𠂔游哀也，𠂔游乐也。𠂔游声，𠂔游心也。喜斯𠂔，𠂔斯奋，奋斯咏，咏斯猷，猷斯𠂔。𠂔，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𠂔，𠂔斯叹，叹斯𠂔，𠂔斯通。通，愠之终也。”这些句子都能够揭示人内在真性情的外露是诚信的体现，能够反映当时社会把对于诚信的价

值追求归于人内在的自然本性当中。简文除了通过鼓励人真性情的抒发来构建社会的诚信体系之外，更是提出了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敬”。简文有云：“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更进一步有“恕，义之方也。义，敬之方也。敬，物之节也”之语。这就为我们展现了当时为人的第一要务以及进行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是“敬”，“敬”不仅仅是对于百姓的要求，更是统治者所要具备的素养和品格。而要做到“敬”，简文又为我们做出了规约：便是要符合“礼”，即“拜，所以□□□，其□敏也。币帛，所以为信与证也，其辞宜道也。笑，礼之浅泽也。乐，礼之深泽也。”此句虽因残简于文义理解不便，但结合后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对“敬”进行了“礼”的限制。尤其是“笑，礼之浅泽也。乐，礼之深泽也”这句话把社会的和谐和诚信强调的十分突出，从而指出了人类社会有别于兽群的根本区别<sup>[19]44</sup>。通过对简文内容的分析，可知《性自命出》主要是从性情说出发为我们揭示了心、性的关系，引出了性情背后所蕴含的“诚”“信”“敬”“礼”等内容，而这些正是此篇简文中所要向大家传导的、希望大家内化于心的德育内容。

## 2.《六德》之血亲伦理

郭店楚简《六德》篇主要从“六位”“六职”“六德”的关系出发来论述“六位”在人伦治理中的作用。

简文开始就有“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此六位也。有率人者，有从人者；有使人者，有事人者；有教者，有学者，此六职也。既有夫六位也，以任此六职也。六职既分，以裕六德”，“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这便向我们表明了“六位”“六职”“六德”的具体内容。“六位”即夫、妇、父、子、君、臣；“六职”即率人者、从人者、使人者、事人者、教者、学者；“六德”即圣、智、仁、义、忠、信。六位即任此六职，从事此六职的六位又必须具备相应的德行。其具体的位、职应具备怎样的德行，简文表述为“义者，君德也”“忠者，臣德也”“智者，夫德也”“信也者，妇德也”“圣也者，父德也”“仁者，子德也”。由上可知“六位”“六职”“六德”的匹配关系如下：

六位：夫、妇、父、子、君、臣

六职：率人者、从人者、教者、学者、使人者、事人者

六德：智、信、圣、仁、义、忠

当六位各司其职，六德与六职相匹配之时，就能达到“而谗谄无由作也”的效果，这也就是当时社会正常运行的机制。

明晰“六位”“六职”“六德”不是此篇简文与笔者写作的目的，笔者是想通过“六位”“六职”“六德”的具体执行来揭示此篇简文背后所蕴含的血亲伦理思想，这也是当时的社会所重视的并向人们传达的一种价值观。

简文有“生民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男女别生言，父子亲生言，君臣义生言”之语，这也就是说在社会进程中先有男女之别，后有父子之亲，最后才生成君臣之义。这也就体现了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过程，正是有了男女的结合人类才得以繁衍并继续发展，才有了人类文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个体家庭开始出现，男性的地位也慢慢提高并最终确立，最后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的基础上形成了早期国家。

这也就能够体现国家是由家庭派生的，国家是由家庭组成的机构。这样的一种状况反映在思想上也就有了简文的“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之言，这里的“内”，也就是家庭，“外”，也就是国家，或者说是社会。那么属于家庭方面的就是“父、子、夫”，属于社会方面的就是“君、臣、妇”。联系上面与“六位”相匹配的“六德”，我们就可以知道，属于家庭伦理的是“圣、仁、智”，属于社会伦理的是“义、忠、信”。正是有了家庭伦理之后才生成了社会伦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针对内、外两个系统中的不同矛盾，简文提供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也就是“仁，内也。义，外也”、“门内之治勿弇义，门外之治义斩弇”。即在家内依照“仁”的原则，在家外依照“义”的原则；家内的治理要用恩情掩盖道义，家外的治理要用道义斩断恩情<sup>[21]</sup>。这也就是张磊先生所说的“宗族内以亲情为原则处理事情，宗族外以道义为原则处理事情”<sup>[22][24]</sup>。如此，社会就能正常的运行。

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之下，所以简文才会提出“为父<sub>𠂔</sub>君，不为君<sub>𠂔</sub>父。为昆弟<sub>𠂔</sub>妻，不为妻<sub>𠂔</sub>昆弟。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这是在面临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出现的矛盾之时，简文的作者主张按照前面提到的方法而做出的行为选择。这也就表明“宗族内的道德处于更高的位置，孝顺父亲先于忠君，父子关系要优先于君臣关系”<sup>[22][25]</sup>。究其根源，是简文中提到的“孝，本也。下修其本，可以断谗”、“男女不辨，父子不亲。父子不亲，君臣无义。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弟”。即家庭中的“孝”思想是根本，这个根本稳固了，就可以断绝社会上的毁谤和谄媚。同时，只有把孝放在首要位置上才能使得男女有分、父子相亲、君臣有义。

综上所述，郭店楚简《六德》篇的德育内容即让民众知晓“六德”“六位”“六职”相互匹配合一的状况，同时对其施以家庭伦理重于社会伦理的教育。

## （二）德育方法

### 1. 《性自命出》之礼乐教化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除了论述发自人内心的性情思想之外，还为修养与锤炼这种性情提供了可行的方法。

综上所述，论述我们知道简文中的“性”源于天，而“性”又将生“情”，最后，“性”还是会回归到人的道德社会。简文有云：“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礼就是根据人内在的情而制定的，是能反映人的真实感受的，是人真性情的外现。“《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诗、书、礼、乐，这些文化载体都与入之情有关，皆是由不同的情而引起的。反之，通过对人们进行诗、书、礼、乐的教化又可促进人内在真性情的开发。简文通过对人真善美之情的分析，然后提出不同的性情在为人处世方面的不同，进一步探讨了解决之道，即通过对人进行礼乐教化从而挖掘人内在最真挚的性情。

简文中提到“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训之，体其义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这也就说明对人进行礼乐教化也应因材施教，以期到达“生德于中”的效果，即将礼乐教化内化于心，更能外化于行。简文一直强调礼乐教化，主要是礼乐教化具有以下两方面的功能：其一，以情进道。我们通过对受教育者进行的礼乐教化加深其对美善之情的认识，进而提升其

内在的美善之情。也就如简文所说的“凡性或动之，或<sub>礼</sub>（逢？）之，或交之，或厉之，或出之，或兼之，或长之。”其二，以道制欲。也就是通过礼乐教化使人们正确认识人性中的弱点，从而舒缓和化解人内在的这种私欲。如简文所云：“凡古乐能心，益乐能指，皆教其人者也。《赉》《武》乐取，《韶》《夏》乐情，”这就表明赉、武、韶、夏等古典音乐能够传达好的价值观，而郑卫之淫乐则会挑起人内在的私欲，所以这就需要用礼乐来加以约束。

简文道：“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舍则宜道也。或舍为之即则<sub>礼</sub>也。至颂庙，所以<sub>礼</sub>，即也。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即，好其颂，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礼乐教化之目的在于使人“生德于中”，然后使人之言行能够符合礼的标准，更是指出了君子所应达到的境界，这也就为当时世人的个人德行方面的修养提供了路径及目标。

## 2. 《六德》之伦理教化

《六德》主要是通过论述“六位”“六职”“六德”的相互关系来达到“而谗谄无由作也”的目的，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也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在这篇简文中，主要通过对君主进行以“六位”“六职”“六德”三者为出发点的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等理论教育，使得统治者将此种理论内化于心并最终外化于行，以望构建一个完整的德行规范体系。

简文有“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尔，使之有向也，非圣智者莫之能也。亲父子，和大臣，寢四邻之抵牾，非仁义者莫之能也。聚人民，任土地，足此民尔，生死之用，非忠信者莫之能也”之语。这里的“圣智者”就是指“具有圣智之德的人”<sup>[23]42</sup>，其负责制作礼乐与刑法，教导人民，此德应当是政治德行。除此之外，“仁义”“忠信”等都属于政治德行。“仁义者”使得父子亲近，大臣和睦，这里谈到的父子也指代君主的父子关系；“忠信者”使得人民聚集，使用土地，满足人民生前、死后的器用，这些都是属于各个层次的人所应该具备的能力。简文有“生民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君子名乎此六者，然后可以断谗。”由此可见，这里所提到的圣智仁义忠信等六德除了各个层次的人应掌握之外，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更应该具有圣智、仁义、忠信等三组德行。这里虽然介绍的是统治者以及各个层次的人所应具备的德行，但也可从侧面向我们反映：要使得统治者及其民众具备这三组德行，那么首先就需要使他们知道自己应具备哪些德行，所以对其进行这些方面的教化是必需的。那么这样的知识我们如何传授给相应的人呢？“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亲此多也，钦此多[也]，美此多也，道御止。”简文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章当中都有相关德行方面的内容，所以要想使得相应层次的人掌握相应的内容，对其进行相应的德行教化是必不可少的，故而《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就成为了向民众教育灌输的基础知识。

各层次的人除了要知道“六位”“六职”“六德”相匹配等内容之外，还应在此基础上区分“内”“外”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等内容，这是民众在处理内外两个方面的事物应遵循的原则，即“门内之治勿弇义，门外之治义斩勿”。在家庭也就是宗族内部用仁处理问题，在宗族外部用道义处理问题。而统一于两者之中的，宗族内外皆可用来解决矛盾的方法即礼乐。简文有云“仁，内也。义，外也。礼乐，



共也。”故而礼乐也是教育当中的重要内容。在先秦的道德教化过程中，除了礼乐教化的方式外，刑罚也是教化的方式之一。简文有提到“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尔，使之有向也，非圣智者莫之能也。”故而对民众的教化过程中，还有可以通过刑罚的方式对民众进行伦理教育。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郭店楚简《六德》篇为我们揭示的德育方法是通过六经进行教育灌输，然后辅以礼乐、刑罚等方式对各层次的人进行相应的道德伦理教育，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

### （三）德育目标

#### 1. 《性自命出》之生德于中

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中，主要谈论的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性情，而这种性情会随着社会习俗、教化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这也就需要对人之性情进行礼乐教化，从而保持人内在的最真挚的性情。当民众拥有了真挚的性情并以之示人的话，就会达到简文“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的效果。故而我们抒发自己真实情感是一种诚信的表现，同时也能够获得别人的信任。关于诚信，简文还提到“凡悦人勿吝也，身必从之”，也就是要说到做到。这里也就说明民众特别是君子应该具备“诚”“信”的德行。

简文提到“恶之而不可非者，达于义者也。非之而不可恶者，笃于仁者也。”这是针对君子而言的，是说作为君子，有人厌恶他却不指责，是因为君子具备了“义”；批评他却不厌恶，是因为君子仁德深厚。简文还云：“闻道反己，修身者也”“修身近乎仁。”这些也就说明君子应时刻反省自身，修正自身的行为，使自己具备“义”“仁”等德行。

“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简文希望通过对民众的教化使这些德行能内化于民众之心，成为其自身德行的一部分，最后能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符合礼。于此，简文中有提到对于君子的要求：“君子执志必有夫皇皇之心，出言必有夫束束之信，宾客之礼必有夫齐齐之容，祭祀之礼必有夫齐齐之敬，居丧必有夫恋恋之哀。君子身以为主心。”这也就体现了君子应“生德于中”，且应将内在的德行外化于行，使德行合一，符合道德规范。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所强调的君子应具备的德行，正是想要通过礼乐教化实现的德育目标，即“生德于中”。

#### 2. 《六德》之的职匹配

郭店楚简《六德》篇主要论述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从前面的论述过程中我们知道，只有当“夫、妇、父、子、君、臣”六位各司其职，德行匹配之时，社会才能正常的运行，那么，这就需要身处各职的人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其途径也就是简文中的“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亲此多也，钦此多[也]，美此多也，道御止”“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尔，使之有向也，非圣智者莫之能也”。即通过对各层次的民众进行《诗》《书》《礼》《易》《春秋》《乐》的教育，以及民众对统治者制定的礼乐和刑法的学习，使得各层次的人各就各位，完善自身应具备的德行。

在具体的处理宗族内部和宗族外部的物事方面,简文为我们提供的方法是“孝重于忠”,也可以说是遵循着亲亲尊尊这样一种原则。这在对民众提出了各司其职、德行相配的要求之外,又提出了新的目标。也就是在达到了前者的要求之上遵循着在宗族内外部用不同的处理事务的原则。

郭店楚简《六德》篇意在通过对“六位”“六职”“六德”之间关系的论述及从内外、亲疏等方面对其进行的具体分析,使得人们在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能够清晰自己的定位,从而使得“位”与“职”相统一,不逾矩。同时,我们也应该不断反省自身,及时调整自己与道德规范不一致的言行,使自己的外在行为表现符合客观的道德规范。故而我们可知郭店楚简《六德》篇所要达到的德育目标也就是各层次的人加强自身的修养,使德行匹配,从而构建一个“**𠂔**亡由作也”的政治秩序。

### 三 郭店楚简相关文献德育思想的价值

#### (一) 推进传统德育思想研究的进展

德育是传统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先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形成的重要源头,其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相关材料的匮乏,我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存在着一定的阻碍,而以郭店楚简为代表的出土文献的问世,极大地推进了传统德育思想研究的进展,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先秦德育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在先秦的思想当中,德育思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先秦德育思想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当时的德育教育主要是通过日常交往、集体生产劳动和原始宗教活动来进行的。在奴隶社会时期,其思想文化具有浓厚的氏族观念和宗教神权的巫术特点。东周末年,因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社会矛盾尖锐,使得礼崩乐坏。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传统思想文化的权威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到了春秋时期,王官下移,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各思想派别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分别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或途径,他们之间互相争论又相互交流融合,在此情形之下,儒生们必然也要应对时代的冲击,发表自己的看法。由于儒生出自王官,历来在贵族教育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他们早期的文献,也十分注重德育思想的内容,他们也希望通过德育的教化,实现他们的理想社会<sup>[24]</sup>。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非常重视对人的德育教育,他提出了很多有关德育的理论。其在《论语·阳货》中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语,就与简文中的“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类似。两者皆认为人的天性是相近的,其不同是因外界的教导而致。这说明简文关于人性的言论与孔子类似,谈到人性论,我们又可以联系另外两位儒家的代表人物,即孟子和荀子,我们知道他们关于人性的观点分别是性善论和性恶论。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两篇简文都是属于儒家文献,那么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与孔子的“性相近”及孟子的“性善论”三者之间有何关联?于此我们可联系到李零先生的观点:“向来的思想史研究,其实有个很大的漏洞,就是近代以来,我们对孔门学案最早的一段,即所谓‘七十子’,不太重视,认为《礼记》是汉代文献,《论语》以外,免谈孔子,老是用‘孔—孟—荀’三段式将早期儒家,把本来最重要的一段给忽略了。”<sup>[31]</sup>



郭店楚简已经基本确定与思孟学派有密切的关联，正属于孔子死后“七十子”传播儒学思想到孟荀继起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儒学非常重要的传承和发展时期，过去由于文献记载的阙如，我们对这一时期儒家的文献活动知之甚少，而现在以郭店楚简为代表的出土文献的问世，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先秦儒生们的思想活动及其后续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从《性自命出》所提到的性情观就可以得到很好地印证，它恰好处在从孔子的人性无善恶之分到孟子的性善论之间，为我们描绘了一条较为清晰的德育思想发展脉络，成为我们研究先秦德育思想的一个绝佳范本。

第二，有助于我们丰富对传统德育思想的认识。相关楚简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为清晰地了解先秦时期许多德育思想的概念和内涵，从而加深相关问题的认识，比如将郭店楚简《六德》篇与先秦的一些文献进行对比，我们发现简文中的“六德”组合是“圣、智、仁、义、忠、信”。而在其他的先秦著作当中，有德行的其他组合。如《论语·学而》中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阳货》中的“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等等。由此观之，在孔子之时，对于德行的组合尚未形成定论，其后各种著作中出现的德行组合，皆是各学者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而制定的。其具体的发展脉络我们现今无从得知，但郭店楚简《六德》篇中的德行组合，便是简文编者根据其政治目的而表达的道德追求，反映出这一时期这一观念的新进展。

除了将郭店楚简《六德》篇与先秦的传世文献进行对比之外，我们还可将其与郭店楚简《五行》篇进行对比。郭店楚简《五行》篇中也提到了五种德行，即仁、义、礼、智、圣。这与郭店楚简《六德》中提倡的六德：圣、智、仁、义、忠、信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两者中都含有仁义圣智这四种德行，而《五行》中有《六德》中没有的礼这种德行，《六德》中有《五行》中没有的忠信。据陈来先生的观点看，“忠信”是春秋时代普遍的德行，而“礼”作为一种德行却不能早于子思、孟子所在的年代，故而陈来先生认为郭店楚简《六德》篇在时间上应该早于《五行》篇。从两者的受众范围而言，《五行》篇中的德行是一种普遍意义的德行，没有特定的主体，而《六德》篇中的德行则只是针对统治者而言，不具有普遍意义<sup>[23]40-46</sup>。

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六德》篇中所体现的道德思想即由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所决定的。所以它们与先秦早期的传世文献倡导的德育思想存在差异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也是德育思想与时俱进的表现。通过对这些思想的分析与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德育思想是如何传播与发展，并最终如何在汉代成型，成为长期影响我们的正统观念。

第三，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时期教育体系的认识。自近代史学转型以来，由于西方史学观念的引入，我们不自觉的按西方哲学史的方式来分析中国的传统学术，在研究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时，习惯于将先秦诸子的思想视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来进行分析，并将各派视为彼此壁垒森严的不同团体。但这一点，正如李零先生所言：“早期的古书多由零章碎句构成，随作随传，常常缺乏统一的结构”<sup>[25]</sup>。而这种思想零散地分布在各简中的情况，正是古书流传的一个重要特点——“古书无定本”的反映<sup>[26]</sup>，这也正反映出先秦学术交流的活跃与知识权威的缺乏。

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体系,不可能形成像汉代那样的“太学”体系,《周礼》中的许多记载,也有很多汉儒的美化成分。即便如此,我们从这两篇简文中抽丝剥茧,依然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教育体系的一些发展面貌,这便使“六经”体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丰富与发展。众所周知,六经与孔子有密切的关联,但具体情况如何?历来争讼未定。而本文所研究的两篇简文,皆有提及六经,特别是《性自命出》一文里,不仅提到六经,还提到圣人,有学者就认为此处的圣人当为孔子无疑<sup>[27]</sup>。是不是孔子我们存而不论,但毫无疑问,《性自命出》反映了六经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儒生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而正如前文所述,《六德》则更进一步将六经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描述,这都反映出六经在这一时期已经较为成熟的成为儒生们开展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六经作为孔门的课程体系已经形成”<sup>[28]</sup>。

可见,对相关简文的研究,能使我们更为清晰地观察先秦德育思想的发展脉络,丰富我们对传统德育思想的认识,加深对这一时期德育思想的了解,有力地推进了相关研究的进展。

## (二) 促进当代德育实践的发展

先秦德育思想是我国儒家德育思想的源头,其在我国的教育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之中,我们要从过去的优秀思想文化当中汲取营养,为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其中,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六德》中的德育思想作为先秦德育思想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从中吸收优秀的成分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从郭店楚简《六德》篇中来看,其弘扬的主要是“仁、义、圣、智、忠、信”等德行,其构成了先秦时期某个阶段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的不同价值内容,在家庭方面即“圣、智、仁”,在社会方面即“忠、信、义”。结合我们当下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可以发现《六德》中的德行内容与当代的核心价值观是有相似性的。《六德》当中的“仁”有仁厚、宽容的涵义,这也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所倡导的“和谐”有异曲同工之妙,且“和谐”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传统中的“仁”经过充分吸收,完全可以与时俱进成为促进新时代“和谐”的推动力;《六德》中的“信”有诚信之义,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中所提倡的“诚信”有不谋而合之处,许多思路和方法仍有可资借鉴的地方;《六德》中的“忠”是臣子所应具备的德行,也就是臣子对于君主应该忠诚,虽然这一思想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但其对忠出发点的剖析与其归宿的诠释,其思路和方法有助于我们分析产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何在;《六德》有“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尔,使之有向也,非圣智者莫之能也”之语,这里的“圣智者”即拥有“圣”“智”两者德行的人能够制定刑法,虽然与现代的法治精神也有一定冲突,但从追求实体公正的角度来说,如何保障立法的公正与效率性,相关简文的见解无疑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这也有助于我们建设与培育新时代的法治精神。由此观之,郭店楚简的相关简文中有许多为我们当今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资借鉴之处,说明这些德育思想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历久弥新。我们现今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可从中汲取营养,丰富其内涵。

自古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语,且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中,修身居于这三者之首,这也就说明了修身的重要性。而我们要达到修身的目标,则需要通过一些相应的方法。

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六德》篇中,我们可以发现其都注重思想教化的作用,希望通过教化有效

地发挥思想的引领作用，使得人们在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能够将当时社会所推崇的思想和理念内化为民众内心的一种道德追求，这样就能够形成民众的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心理倾向等等，也就能够达到教化的预期目标。在《性自命出》中，其注重礼乐教化对于人行为习惯的塑造作用，希望通过对人进行礼乐教化改变人的心性，培育人的德性。在《六德》篇中，也提到了礼乐教化，同时也重视刑罚对民众的教化功能。因而在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我们可以继承和学习其中的德育方法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个人的价值理念当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德育思想的教化作用联系起来，发挥传统德育思想的感染力，让大家在感受传统德育思想的魅力之时将相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规范。

### 参考文献：

- [1] 王国维.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C]//谢维扬, 房鑫亮. 王国维全集: 第十四卷.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 239.
- [2] 李学勤. 走出疑古时代[M]. 沈阳: 辽沈大学出版社, 1994: 8-19.
- [3] 李零. 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4]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177-190.
- [5] 李学勤. 郭店楚墓文献的性质与年代[C]//艾兰, 魏克彬, 刑文, 译. 郭店老子: 东西方学者的对话.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 7.
- [6] 彭华. 郭店楚简研究评述[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1(3): 33.
- [7] 李学勤. 关于“东宫之师”的讨论[M]//李学勤, 谢桂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 简帛研究二〇〇一,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8] 李学勤. 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J]. 中国哲学, 2000(20): 79.
- [9] 刘宗汉. 有关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两个问题: 墓主人身份与儒道兼习[J]. 郭店楚简研究, 2000(5).
- [10] 廖名春. 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J]. 孔子研究, 1998(3).
- [11] 姜广辉. 郭店一号墓墓主人是谁? [J]. 郭店楚简研究, 2012(5): 396-399.
- [12] 范毓周. 郭店楚简墓主当为环渊说[N]. 人民政协报, 1998-12-26(10).
- [13] 李裕民. 郭店楚墓的年代与墓主新探[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3): 25-27.
- [14] 高正. 郭店竹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定位: 兼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的关系[J]. 中国哲学史, 2000(2): 65-66.
- [15] 王博. 美国达慕思大学郭店〈老子〉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M]//陈鼓应. 道家文化研究. 第十七辑. 上海: 三联书店, 1999.
- [16] 李零. 郭店楚简研究中的两个问题[C]//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 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47-48.
- [17] 彭浩. 郭店一号墓的年代与简本〈老子〉的结构[M]//陈鼓应. 道家文化研究. 第十七辑. 上海: 三联书店, 1999: 16.
- [18] 陈万柏、张耀灿.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173.
- [19] 欧阳祯人. 出土简帛中的政治哲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 [20] 郭沂. 〈性自命出〉校释[J]. 管子学刊, 2014(4): 98-113.
- [21] 刘钊. 郭店楚简校释[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105.
- [22] 张磊. 郭店楚简〈六〉与早期儒家孝道观[J]. 齐鲁文化研究, 2008.
- [23] 陈来. 早期儒家的德行论: 以郭店楚简〈六〉、〈五行〉为中心[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2).
- [24] 舒大刚. 儒学文献通论[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 13-25.
- [25] 李零. 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1(1): 27.
- [26] 谢科峰. 早期古书流传问题研究: 以相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为例[D]. 上海: 上海大学, 2015.
- [27] 李天虹. 从〈性自命出〉谈孔子与诗、书、礼、乐[J]. 中国哲学史, 2000(4): 41-43.
- [28] 王独慎. 试论郭店楚简在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价值[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18(6): 56-62.

# **Analysis of the Thoughts on Moral Education in Pre-Qin Period Manifested in Disposition Stems from Fate and Six Virtues in Guodian Bamboo Slips**

CAI Li-hong

(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417000, China)

**Abstract:** Disposition Stems from Fate and Six Virtues are the two representative Guodian bamboo slips with similar characters, and their elaboration on the content of moral education is centered on “disposition” and “blood ethics” respectively. These two essays highlight the role of “education by rites and music” and “ethics education”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moral education methods; in terms of the goals of moral education, they focus on “generating morals inwardly” and “matching morals and condu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texts of the two bamboo slips, and further examines the value of the pre-Qin moral education in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al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Guodian bamboo slips; Disposition Stems from Fate; Six Virtues; thoughts on moral education in Pre-Qin Period

(责任编辑: 舒阳晔)